

五、中共各地放鬆疫情管制後官方維穩及民情觀察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所長陳志柔主稿

- 中共對白紙抗議採取安撫、抓捕、軟硬兼施，以特權身份區別對待稀缺特效藥 Paxlovid 的發放和銷售，持續監控具組織能力的維權群體。
- 中共依訴求採取壓制與回應，對於政治層面訴求仍舊強勢回應，非政治層面訴求則做出形式或實質上的讓步，並針對不同階級、身份區別有不平等的回應方式。

（一）動態清零與白紙抗議

2022 年 12 月上旬，習近平決定結束動態清零，主要是因為既有的社區網格化管理、全民 PCR 等措施難以阻止新冠疫情的流行。根據微信公眾號「城市數據團」一篇已被審查的文章顯示，在臺灣、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等地，發燒、fever 等關鍵詞的 Google 搜尋指數，都與確診人數高度相關甚至有領先趨勢。在 11 月 26 日白紙抗議爆發前一週，在北京與周邊的保定、石家莊等城市，「發燒」關鍵詞的百度搜索指數亦呈現上升趨勢；12 月 3 日，這三個城市的搜尋指數更超越 2022 年 4 月的上海和 10 月的烏魯木齊。以搜尋指數的標準差作為判斷依據，11 月底在河北、北京、重慶、湖北、雲南、四川、山東、甘肅等省級行政區中，其中 26 個城市的關鍵詞搜尋指數都已經超過了兩個標準差，足見達到了群體感染且無法通過動態清零措施得以壓制下來。

北京大學國發院的研究報告也證實，在 12 月 7 日「新十條」推出後 13 天，即 12 月 20 日，全大陸多地疫情就已達到高峰。截至今年 1 月 11 日，全中國大陸新冠感染率累積約達到 64%，感染人數累積約 9 億。去年 11 月底，中方防疫政策發生兩項重大的轉向：（1）11 月 30 日，副總理孫春蘭在國家衛健委座談會上強調 Omicron 致病性減弱，並且不再提堅持動態清零政策。（2）12 月 7 日宣布的「新十條」當中，包含不再隨意劃分高風險

區、放棄全民 PCR、取消多數公共場所查驗健康碼、允許居家隔離取代安置方艙醫院等政策，顯示中國政府已實質上放棄動態清零政策。

中止動態清零政策，等於放棄先前綿密的網格化治理、與針對疫情的大數據監控，防疫重回公共衛生的範疇。然而值得討論的是，在 12 月 7 日之後，因疫情擴大而開展的「抗議—維穩」模式，以及當中顯現的社會經濟問題。

（二）白紙抗議後續—醫科學生的抗爭

烏魯木齊火災所引發的白紙抗議，始於南京傳媒學院，擴散到上海、北京等城市與各知名大學，以及更早的「四通橋事件」，皆反映人們對於動態清零政策的強烈不滿，甚至上升到政治訴求。中共採取的應對策略是軟硬兼施，一方面安撫學生。從 11 月 27 日的清華大學開始，許多學校提前結束學期讓學生返鄉，且不追究聚集抗議學生的責任；另一方面，政府對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等城市街頭的抗議者展開事後抓捕。雖然抓捕措施受 Omicron 疫情擴大被迫中止，至今卻仍無公開資料呈現被捕的抗議者身份。12 月 7 日發布的「新十條」放寬各地的動態清零措施，但疫情感染率也隨即開始飆升，並將防疫壓力從基層社區轉移至各級醫院。12 月 12 日至 12 月 19 日，四川大學、徐州醫科大學、中南大學等多所醫科大學與其他知名醫學院的學生發起了新一波的抗議。

醫學院學生的訴求包含三點，（1）缺乏保障的工作環境：疫情升溫造成醫療資源普遍匱乏，尤其是 N95 口罩配額不足，提高醫護人員感染的機率（12 月 13 日華西醫科大學的碩士生陳家輝去世；12 月 19 日中南大學湘雅第二附屬醫院的規培生即使感染仍需帶病工作）。（2）薪資遠低於工作付出（徐州醫科大學的碩士生每個月補貼僅 1300 元人民幣，且陽性隔離需另扣每日 100 元人民幣。他們的工作內容接近正式醫生，薪資卻不成比例，令他們發出了同工同酬的訴求）。（3）不平等的規培生體制規定：醫院存在特殊的「規培生」制度，本科、碩士、博士畢業的醫學生分別需要經歷 3 年、2 年和 1 年的住院醫師學徒制訓練，規培生能否取得醫生的資格由醫院掌握，特別是只有本科學歷的規培生大

多只能服從既有規定，也只有在校學籍的研究生敢於上街發聲提出訴求，不屬於醫院科室的碩士生才能在導師、學校與醫院之間的制度縫隙中，取得一定的集體抗爭能力。

然而，這波抗爭的結果大多以學校允許研究生放假、要求規陪生仍需在崗工作，而而在短短一週之內被壓制下去。

(三) Paxlovid 與布洛芬：藥品管制、不平等與虛假資訊

在疫情大流行的當下，中國社會存在藥物資源極度短缺的問題，包含布洛芬 (Ibuprofen)、與輝瑞的特效藥 Paxlovid，而這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嚴格的藥品管制制度、身份上的分配不平等、社交媒體上的資訊戰。就如微博博主「破破的橋」所說「有渠道有背景的北京人用上輝瑞特效藥，沒渠道但有財力的高階中產去澳門約輝瑞疫苗排期排到明年二月份，啥都沒有的在那裡傳輝瑞上海高管新冠趨勢的謠言，研究怎麼防止資本滲透」。

早在 2012 年，中共公安部、衛生部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為避免麻黃鹼被用於製毒，聯合發佈對含麻黃鹼的感冒藥進行加強管理，其中包括實名登記制度，造成原本在藥店常見的減緩鼻塞的感冒藥近乎絕跡。而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後，藥店更被限制銷售其他類型的感冒藥，以管控新冠感染者。同時政府動用國家力量推廣「蓮花清瘟」等中成藥物，提供新冠輕症患者及一般感冒患者服用。長期嚴格的藥物管理制度使得人們在家中缺少常規儲備，導致當疫情管制一放寬，真正能夠減緩症狀的感冒退燒類藥物很快隨著疫情擴大而供不應求，甚至波及周邊國家的感冒藥銷售狀況。

Paxlovid 的發放和銷售成為特權化的趨勢。例如，提出全民 PCR 的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新浪微博 CEO 王高飛、財新傳媒助理總裁安替，憑藉在北京的特權階級背景，他們都有渠道可以獲得藥物，並且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購買使用的資訊。具有公衛背景的北京市委書記尹力要求在北京社區醫院配送 Paxlovid。絕大部分人們只能在「京東」等網購平臺上，搶購各平臺每日數百份的限額。可見在 Paxlovid 短缺的情況下，黨國仍採用保

存既有身份分化的區別對待。相比其他國家，應當由醫生問診後開立 Paxlovid 為處方藥，Paxlovid 在中國卻彷彿是黑市流通的強勢貨幣。

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虛假藥物資訊。因大部分人口難以獲得 Paxlovid，且難以接觸中共掌控外的資訊網路，在微信、微博和抖音等社交媒體上，他們皆面臨著虛假資訊的困境。例如，民族主義博主、「愛國大 V」們仍延續著近三年來的官方宣傳路線，質疑 BNT 疫苗與 Paxlovid 等的有效性。而這樣的作用力延續至今，虛假資訊幾乎成了緩解中下階層焦慮的止痛藥「布洛芬」，發揮一定的維穩作用。

（四）第一波大流行之後：煙花抗議與上街討薪

目前中國大部分區域皆經歷了一輪感染高峰，大部分感染 Omicron 的青壯年已經從輕症狀態中康復，而這卻帶來另一波的不確定性。原本在經濟成長率與就業率相對有保障時，人們較有意願接受政府的管制措施；但在這三年疫情中，失業率升高、普遍低薪，中小企業主、自營作業者皆承擔動態清零政策所帶來的巨大損失。民眾挫折需要宣洩情緒，也可能選擇在元旦至春節期間內上街維權，取消疫情防控如同打開被悶了三年的高壓鍋，接下來將需要不斷回應廣大民眾提出的訴求。

首先，隨著城市擴張，官方近年加強管控燃放煙火（中國大陸稱煙花）。2020 年後幾乎大部份城市市區內都禁止燃放煙花，但在 2023 年新年之際，多地民眾不顧地方政府禁令，仍攜帶煙花上街慶祝新年，並出現警民衝突（例如，河南周口市鹿邑縣發生砸警車騷亂事件）。顯然，人們在經歷清零三年所遺留的壓力與困境，格外需要在節日慶祝宣洩，持續嚴格的煙花燃放禁令將加劇警民衝突。因此，北京、遼寧、山東等部分地區皆調整了燃放煙花爆竹的禁令。

其次，在新年過後，多地出現大量的集體討薪行動。其中許多是農民工討薪行動，與地方政府基礎建設、或地產公司相關，前者的目標直指地方政府，而公安部在 12 月 28 日的通知中，亦強調打擊惡意欠薪與保障農民工權益。這些討薪行動多數為數十人的規模，並沒有出現跨團體集體在政

府前陳情的現象，但倘若地方政府採取拖延策略，加上未來數月之內，反覆的疫情、持續惡化的經濟情勢，這些集體行動會不會升級抗爭，仍然有待觀察。另外，去年規模最大的金融受害者群體之一河南村鎮銀行儲戶，也再次上街維權，而國家對這些儲戶的控制仍然維持著大數據監控、限制乘坐公共交通、部分積極份子被屬地警方帶走並失聯，顯見中共仍持續監控重點維權群體。

（五）結語—不確定性下的抗爭與回應

在財政困境、白紙抗議和疫情大流行難以阻擋等因素的趨勢下，當中國政府放棄動態清零政策，會引發新一輪「衝突—壓制—回應」。例如，海外維權網估計，因參與白紙運動被捕者大約有 100 多人，不知名的被捕者的名單可能還會增加；這份聲明列舉了已知姓名的 32 名被捕人士。由於參與抗議的年輕人與傳統異議、維權人士不同，不具有人際網絡資源，難以統計被傳喚、拘留或逮捕的年輕人總數。然而，從白紙運動抗議以來，中共的壓制與回應當中仍能顯露部分政府的機制邏輯：

1. **對於政治層面的訴求。**當前中共的政治菁英仍然會採取強勢的回應。被抓捕的抗議人士命運如何，目前僅能靜觀其變。在 11 月 29 日的中央政法委員會和 12 月 28 日的公安部通知中，均強調需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破壞活動。政法部門頻繁提及「敵對勢力」一詞，是否以此標籤化並追究參與白紙抗議的年輕人，仍有待觀察。
2. **對於集體行動、非政治層面的訴求。**黨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往往會積極回應，但未必有相應的實際成效。相比北京亮馬橋和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抗議的政治訴求，從大學生、街頭燃放煙花的民眾、與討薪的農民工，政府多少都有做出形式上或實質上的讓步。然而，學者曾指出中國政體的特徵是「有回應沒問責」（responsive without accountability）。反覆的國家政策與地方經濟困境，嚴重影響人們的生計，國家難以對此全面負責補償。

3. 持續階級身份區別的不平等回應。在 Paxlovid 案例中，政府對不同階層人士採取了不同的回應，特權階級可以售賣、流通、交換處方藥，由此獲得政府的安撫。普通民眾則被大量的虛假資訊所掩蓋。如此再次體現了中國社會裡巨大的經濟及資訊不平等，中國政府因此得以降低社會不滿，達成穩定統治。

但動態清零政策的失敗，仍對中共的正當性產生傷害。中共政府仰賴社區網格化管理及大數據監控，將資源投入方艙、PCR 檢測站、「大白志願者」和健康碼等種種管控措施；沒有在疫情期間加強公衛體系並強化醫藥資源準備，如此註定了無準備開放的慘烈後果。動態清零政策仰賴的大數據監控在管制放寬後變得毫無意義，社區「大白志願者」也就地解散。未來中共的社會控制將進入不確定階段，之後的幾波大流行能否得到平緩且有效控制、製造業生產和出口能否恢復、房地產和人民生計能否停止下跌，都出現不容樂觀的信號，邁入不安及灰色的 2023 年。